

早期廣州話完成體標記「嘵」的來源和演變*

郭必之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

片岡新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問題的提出

一般討論廣州話的專著在談及完成體標記¹時，都會包括以下兩個項目：（一）「咗」，讀[*tʃɔ³⁵*]，²常黏附在動詞、動結式、動趨式短語或形容詞之後，³大致相當於普通話的「了₁」，例如「食咗飯喇」（吃了飯了）；（二）依附在動詞後頭的高升變

* 本文為「近代粵語的演變——早期廣東話話語材料研究」計劃（由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基金贊助，編號：CUHK 6055 / 02H，主持人：張洪年教授）的階段性成果。初稿曾經在香港語言學學會「第四屆粵語討論會」（WOC-4，香港城市大學，2005年4月）和「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計劃第十一屆年會」（上海復旦大學，2005年9月）上宣讀。李行德、施其生、張洪年、張雙慶、陳以信、湯志祥、葉鳳霞、鄧思穎、錢志安、鍾東、關瑾華（筆劃序）諸位師友，或反復論難，或惠示語料，筆者受益匪淺。兩位評審員提出了很多值得參考的建言，我們也得到很大的啟發。在此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文中如有任何錯誤，均由作者負責。

¹ 英語的 aspect 有多種譯法，例如「動相」、「情貌」、「動態」、「情態」等，這裏我們採用劉丹青的方案，譯作「體」。參閱劉著：〈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載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5年），頁9–33。

² 本文廣州話的標音，除特別標明者外，均依李新魁等：《廣州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的系統。引用時作了兩個改動：（一）送氣符號由「’」改為‘h’；（二）陰平調一律標為55。換言之，沒有55和53的區別。

³ 關於「咗」出現的場合，可參考以下幾種具代表性的著作：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
〔下轉頁92〕

調35，例如「落咗堂未」（下了課沒有）[lɔk²² tʃɔ³⁵ tɔŋ¹¹ mei²²] 也可以說成 [lɔk²²⁻³⁵ tɔŋ¹¹ mei²²]。「咗」和高升變調在表達動作完成方面基本沒有分別，但後者出現的範圍比較局限，尤其在香港粵語裏。張洪年指出：「〔變調〕這個現象可能是廣州粵語的殘留，現在的香港人已經不大用了，特別是陰平陰入的字，大多數都把『咗』字說出來。」⁴

作為完成體標記，「咗」和高升變調的使用範圍幾乎遍及整個廣府片粵語區。⁵據近人調查，以「咗」表完成的方言點有廣州市區、香港市區、新界蕃田、新界泰亨、新界三門仔、澳門市區、番禺市橋、花縣花山、從化城內、佛山市區、三水西南、高明明城、清遠、佛岡、英德、韶關、曲江馬壩、仁化、樂昌和肇慶高要；⁶而高升變調則活躍於西江流域肇慶一帶。⁷如果只根據這些材料，再配合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法 (comparative method)，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把原始 (proto-) 廣府片粵語的完成體標記擬構為*tʃɔ^{陰上}。

眾所周知，研究一種語言的歷史，除了拿它跟具發生學關係 (genetically related) 的語言進行比較外，還需要參考文獻信息。近十幾年來，學界開始注意到利用由西洋傳教士記錄的文獻去研究早期漢語方言的重要性。游汝杰曾經這樣評論這些材料的價值：

〔上接頁91〕

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年），頁144–47；Stephen Matthews（馬詩帆）and Virginia Yip（葉彩燕），*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204–5；李新魁等：《廣州方言研究》，頁554；彭小川：〈廣州話的動態助詞「咗」〉，載胡明揚（主編）：《漢語方言體貌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226–39；Hilary Chappell（曹茜蕾），“The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Jó in Cantonese Yue Spoken Narratives,” in *Studia Linguistica Serica*, ed. Benjamin K. T'sou (Hong Kong: Language Information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pp. 145–73。

⁴ 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頁145。

⁵ 廣府片粵語分布在廣州、番禺、順德、南海、佛山、三水等二十多個縣市境內，參閱熊正輝：〈廣東方言的分區〉，《方言》1987年第3期，頁161。

⁶ 參考詹伯慧、張日昇（主編）：《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之二（香港：新世紀出版社，1988年），頁277，「睡了」條；同編者：《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609，「睡了」條；同編者：《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613，「睡了」條；張雙慶、莊初昇：《香港新界方言》（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724，「餓死了」條。

⁷ 黎緯傑：〈粵方言的變調表完成體〉，載詹伯慧（主編）：《第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82。

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上半期來華的西洋傳教士，翻譯、編寫、出版了種類繁多的漢語方言聖經譯本（其中有一部份為羅馬字本）和方言學著作（有羅馬字對音），這些文獻記錄、描寫並研究了當時各地漢語方言口語，在廣度、深度和科學性方面遠遠超過清儒的方言學著作，也是同時代的其他文獻，如地方志和方言文學作品所望塵莫及的。⁸

西洋傳教士沒有傳統中國「雅言中心觀」⁹ 的桎梏，能夠以平等的心態對待各種方言。另一方面，為了達到實用的目的，他們的作品比較講求反映當時語言的真貌。以上種種，解釋了為甚麼傳教士在方言學著述方面，擁有比清儒更高的水平。在廣東省，粵語一直是強勢方言，使用人口眾多，而且有香港這一塊英國殖民地，傳教士留下的方言文獻數量也因此特別可觀。據游汝杰的統計，單單是廣州話《聖經》就有146種之多，其中129種為漢字本，17種為羅馬字本；此外還有詞典、課本、語法等90種。¹⁰ 可以說，這些材料都是窺探粵語史重要的窗口。那麼到底一百多年前的廣州話，是否如比較法預期中那樣、用*tʃɔ̄^{陰上} 作為完成體標記呢？

結果教人相當意外，最早編成的幾部廣州話文獻幾乎都不用「咗」。¹¹ 它們有的不用標記，¹² 有的用「了」，¹³ 而最主要的標記——即本文的主題——是「曉」。對大部份以廣州話為母語的人來說，「曉」這個字恐怕是相當陌生的。就文獻的記錄而言，「曉」似乎在1840年左右才進入廣州話，1940年左右逐漸消失，活躍的時間

⁸ 游汝杰：《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5。

⁹ 「雅言中心觀」是指古代中國人從雅言（標準語）角度去觀察「方言」（非標準語，包括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一種觀念。這種觀念支配了中國語言學近二千年。何大安〈從中國學術傳統論漢語方言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3卷第4期〔1993年〕，頁714–17）對此有詳細的分析。

¹⁰ 游汝杰：《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頁17, 21。

¹¹ 就我們手頭上的資料看，「咗」最早見於 S. W. Williams（衛三畏）的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1856)，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才開始成為主流。參考 Samuel Hung-nin Cheung (張洪年), “Completing the Completive: (Re)constructing Early Cantonese Grammar,” in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yntax*, ed. Chaofen Su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10*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1997), p. 152 表2的統計。

¹² 如 E. C. Bridgman (裨治文),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 W. Williams, 1841)。此書一般用「了」作為完成體標記，但也有些情況不用標記。見 Cheung, “Completing the Completive,” pp. 153–54。

¹³ 如 S. W. Bonney, *A Vocabulary with Colloquial Phrases, of the Canton Dialect* (Cant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54)。

只有一百年。這個完成體標記的來源是甚麼？它有甚麼語法特點？為甚麼會在1940年左右消失？現在還有沒有粵語方言以「曉」或它的同源詞作為完成體標記？釐清這些問題，對研究粵語史、甚至漢語語法史都會有深遠的意義。

我們會首先羅列古文獻中「曉」的各種用法，並拿它和今天廣州話的「咗」加以比較。接著嘗試到其他粵語方言裏尋找線索，進而從音韻和語法兩個層面出發，給出「曉」的語源和它演變的路線。

基本材料介紹

在正式進入正題之前，先介紹一下各種早期廣州話語料的資料，按出版時間的先後排列：

1. Devan, T. T. 1847. *The Beginner's First Book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anton Vernacular)*. Hong Kong: n.p. (簡稱 Devan 1847).
2. Bonney, S. W. 1854. *A Vocabulary with Colloquial Phrases, of the Canton Dialect*. Cant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簡稱 Bonney 1854) .
3. Williams, S. Wells (衛三畏) . 1856.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Canton: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簡稱 Williams 1856) .
4. Preston, C. F. 1863. 《耶穌言行撮要俗話》。廣州：福音底雙門堂 (簡稱 Preston 1863)。¹⁴
5. French. 1866. 《述史淺譯》。Cantonese translation of *Bible History for the Least and Lowest*. Canton: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簡稱 French 1866).¹⁵
6. Louis, W. 1867. *Das Evangelium des Lucas im Volksdialekte der Punti Chinesen* (《路加傳福音書本地俗話》) . Hong Kong: Rheinischen Missions Gesellschaft. Printed on behalf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in England (簡稱 Louis 1867) .¹⁶

¹⁴ 原書沒有注明作者，此係據 James D. Ball, *Reading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Being Selections from Books in the Cantonese Vernacular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Romanised Spelling* (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 1894), p. XXVI 補。

¹⁵ 原書並無注明作者，但 Ball 曾經提及此書，並指出作者是 Mrs. French，見 *Reading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p. XXVI。

¹⁶ 原書沒有注明作者，此係據 H. W. Spillett,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75), p. 130 補。

7. Piercy, G. 1871. 《天路歷程》。Cantonese translation of *The Pilgrim's Progress* by Bunyan. Canton: English 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 Society (簡稱 Piercy 1871) .
8. Dennys, Nicholas B. 1874. *A Handbook of the Canton Vernacul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eing a Series of Introduction Lessons, for Domestic and Business Purposes*. London: Trübner & Company (簡稱 Dennys 1874) .
9. Burdon, J. S. 1877. 《散語四十章》。Hong Kong: St. Paul's College. Partial Cantonese translation from 《語言自邇集》: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Prepared by Thomas Francis Wade and Walter Caine Hillier* (簡稱 Burdon 1877) ¹⁷ .
10. Ball, James D. 1888. *Cantonese Made Easy: A Book of Simple Sentences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Rendering of English Grammatical Forms in Chinese* (2d ed.). Reprint.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簡稱 Ball 1888) .
11. Stedman, Thomas L. and K. P. Lee (李桂攀) . 1888. *A Chinese and English Phrase book in the Canton Dialect: Dialogues on Ordinary and Familiar Subjects for the Use of the Chinese Resident in America, and of Americans Desirous of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Each Word Indicated in Chinese and Roman Characters*. New York: W. R. Jenkins (簡稱 Stedman and Lee 1888) .
12. 麥仕治。1893。《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講義》。廣州：羊城十八甫文寶閣（簡稱《麥書》〔1893〕）。
13. 麥仕治。c.1893。《麥仕治廣州俗話詩經講義》。廣州：羊城十八甫文寶閣（簡稱《麥詩》〔c.1893〕）。
14. Ball, James D. 1912. *How to Speak Cantonese: Fifty Conversation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 Free and Literal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Romanised Spelling with Tonic and Diacritical Marks, etc.* 4th ed. Hong Kong: Kelly and Welsh (簡稱 Ball 1912) .
15. Wisner, O. F. 1927. *Beginning Cantonese (Rewritten): Part One (Chinese)* (2d ed.). Canton: 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簡稱 Wisner 1927) .

¹⁷ 原書沒有注明作者，此係據 Ball, *Reading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p. XXVIII 補。

16. 譚季強。1930s。《分類通行廣州話》。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民俗叢書122。臺北：東方文化書局影印，1975年（簡稱譚季強1930s）。

余靄芹最近建議把粵語的歷史語料分為五類：（一）關於廣州方言；（二）關於中國；（三）粵人寫的資料；（四）教科書；（五）聖經及宗教性的資料。¹⁸ 上述十六種材料以第四和第五類為主，麥仕治和譚季強的作品則屬於第三類。值得一提的是：麥仕治的兩部著作，由於針對的讀者是「教育得稍識箇字者」，希望他們「明白此書中之趣味」，所以「逐句書句，音註以俗話」（《麥書·序》）。這種體制，和西洋傳教士編訂的教科書其實沒有太大差別。更重要的是這兩部書篇幅長、語料足，對研究粵語語法史有不可或缺的價值。

「曉」在早期廣州話裏的用法

和「咗」一樣，「曉」在早期的文獻中並沒有固定的寫法。大部份材料把它寫作「曉」，Stedman and Lee (1888) 寫作「咻」，《麥書》和《麥詩》則作「僥」。為了行文方便，除援引實例外，其他情況下本文一律把它寫作「曉」。讀音方面，Stedman and Lee (1888) 把它標成 *heu*，唸陰平調；其他材料一律標作 *hiu*，陰平調。按照後一種讀法，「曉」應該和「僥」、「澆」、「囂」同音。

「曉」最早的用例見於Devan (1847)。較後出版的Williams (1856) 也收錄了這個詞，並稍作解釋：“a word denoting past time.” (Williams 1856:86) 下面舉一些實際的例子。我們根據賓語的有無、補語的有無、以及它們出現的位置，把例句分為四類。句末列出原書的英文翻譯。沒有英文對照的，我們就把它翻譯為現代書面漢語：

【一】V / Adj + 晓 (A 類)

- (1) 你錯曉咯。*You were mistaken.* (Devan 1847:100)
- (2) 嘰間房嘅檯椅都爛曉。那屋裏那些桌子都爛了。(Burdon 1877, Ch.7)¹⁹
- (3) 唔見曉咯。*It is lost.* (Ball 1888:81)

¹⁸ Anne O. Yue (余靄芹), “Materials for the Diachronic Study of the Yue Dialects,” in *The Joy of Research: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 Feng Shi and Zhongwei Shen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71.

¹⁹ 所有採自Burdon (1877) 的例子，都用原書的官話翻譯。

- (4) 共又唔好來个忘記僥。而且不要忘記了。(《麥書》〔1893〕1.13a)²⁰
 (5) 隻艇嚟曉咯。那條小船來了。(Wisner 1927:95)

「A類」包括所有以「曉」作完成體標記，但既沒有賓語、又沒有補語的謂詞性成份。在我們看過的例子中，「曉」總是出現在謂詞的後頭，這點和現代廣州話的「咗」是沒有分別的。不過，下例中的「曉」，卻似乎不能用現代廣州話的「咗」去代替：

- (6) 我有行曉。*I have walked.* (Dennys 1874:30)

現代廣州話「有 + VP」結構的「有」是一個助動詞，它的作用是強調「『肯定一種情況存在』，即肯定有這麼一回事」，²¹ 後頭的動詞短語一般不帶體標記。²² 例(6)的「有行曉」，到底是Dennys根據的材料有誤，還是反映了「曉」的性質和「咗」不完全一樣，目前不能確定。

【二】V + 曉 + O (B類)

- (7) 佢去曉邊處呀？*Where has he gone?* (Devan 1847:95)
 (8) 佢已經開曉你眼。他打開了你的眼睛了。(Preston 1863:65)
 (9) 佢脫曉衣服嚟瞓。他脫了衣裳躺。(Burdon 1877, Chap. 11)
 (10) 呢啲白衫，洗咗幾多銀呢？*How much is it for washing those shirts?* (Stedman and Lee 1888:83)
 (11) 將僥隻杯傳交俾過個位禮讚大臣之後……把杯子交了給那位禮讚大臣之後……
 (《麥書》〔1893〕5.31b)²³

我們把帶完成體標記「曉」的動賓結構歸入「B類」。「曉」無一例外地出現在動詞和賓語之間，組成「V + 曉 + O」結構，這和現代廣州話的「咗」是一樣的。事實上，文獻中不難找到「曉」、「咗」在動賓結構中互換的例子：

²⁰ 1.13a 代表卷一頁十三上，下倣此。

²¹ 施其生：〈論「有」字句〉，載施其生：《方言論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52。

²² 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已經指出：「『咗』字一般不能和『有、冇、未』諸字並用。」（頁147）但他沒有詳細解釋原因。

²³ 余靄芹這樣評論《麥書》中的「將字句」：「『將』字句的處置式用得異常普遍，而且『將』字尚有動詞性，可帶體貌標志。」見所著：〈粵語方言的歷史研究——讀《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中國語文》2000年第6期，頁502。

- (12) 抹喫嘅字紙落火爐喇……嘅有用嘅物件就抹咗佢喇。把那些草稿扔進火爐裏去吧……把那些沒用的東西扔掉吧。(Wisner 1927:140)
- (13) 鎮邦街燒咗一概，連阜安棉安街都燒嘵好多。鎮邦街被燒了一部份，而阜安棉安街也被燒了很多。(譚季強 1930s:11)²⁴

這兩個例子可以說明：「嘵」、「咗」在某些情況下，肩負著完全一樣的功能。

【三】V + C + 嘵 (C 類)

- (14) 我食厭嘵波羅咯。I am tired of eating pineapple. (Devan 1847:91)
- (15) 故此唔害得成二徒就出去嘵。加害不成二徒就出去了。(Piercy 1871:104)
- (16) 係佢吹熄嘵。他給吹滅了。(Burdon 1877, Ch.8)
- (17) 避去僥上天所降責的時災時禍。避開了由上天降責下來的災禍。(《麥書》[1893] 2.33a)
- (18) 就先同我來約定僥日子。就先跟我約好日子。(《麥詩》[c.1893] 1.21b–22a)
- (19) 我打爛嘵個花樽呀。我把花瓶給打破了。(Wisner 1927:180)

「嘵」出現在整個動補結構之後，我們把它稱為「C 類」。「C 類」有的時候還可以帶賓語，組成「V + C + 嘵 + O」，如例 (14)、(17)、(18) 和 (19)。粵語補語的類型十分豐富，張洪年曾建議把它們分為九類。²⁵ 在現代廣州話裏，體標記一般出現在整個動補結構的後面，²⁶ 例如：

- (20) 我打爛咗個花樽呀。我把花瓶給打破了。(結果補語)
- (21) 瞳著咗覺。睡著了。(狀態補語)

但當方向補語帶體標記時，表現卻不一樣。如果動補結構不帶賓語，而補語是「嚟」或「去」，體標記一般會出現在動補之間，如「返咗嚟」(回來了)、「行緊去」(正在去)。²⁷ 這條規則似乎並不完全適用於早期的廣州話。例 (15) 有「出去嘵」、例 (17) 有「避去嘵」，同屬「V + 去 + 嘵」結構。這種現象，在《麥書》和《麥詩》特別常見。這裏多舉四個例子：

²⁴ 這兩個例子 Cheung, “Completing the Completive,” p. 142 曾經引述過。

²⁵ 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第三章。這九類分別是「結果補語」、「狀態補語」、「強化補語」、「方向補語」、「能性補語」、「回復補語」、「描寫補語」、「程度補語」和「黏附性詞組補語」。

²⁶ 基本上只有結果補語、狀態補語和方向補語可以帶體標記。

²⁷ 參閱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頁117–18 的分析。

- (22) 兼又離遠去僥、唔肯親近個的年高有德的老人。而且又疏離、不肯親近那些年高有德的老人。(《麥書》[1893] 2.21b)
- (23) 帕逃走去僥。這樣跑掉了。(《麥書》[1893] 5.50b)
- (24) 就唔能來綑綁得起，咁拈去僥。不能把它綑起來拿走。(《麥詩》[c.1893] 1.20b)
- (25) 共又唔在我死去僥之後呢？又(為甚麼)不在我死了以後呢？(《麥詩》[c.1893] 3.26b)

我們認為：這種結構之所以和現代廣州話相異，關鍵在於「去」，而不在於「曉」。因為當時的「去」和其他體標記如「了」、「晒」²⁸結合時，同樣出現在它的前面，構成「V + 去 + 了 / 晒」：

- (26) 飛去了。*Flown away.* (Bonney 1854:70)
- (27) 俱被個的兇惡的賊人來搶奪去晒。都被那些兇惡的賊人搶走了。(《麥書》[1893] 3.2b)

還有一些拿「去」和「曉」/「晒」對舉的例子，也很值得注意：

- (28) 帕來旱乾晒，枯槁去。這樣把它乾濕。(《麥詩》[c.1893] 1.35a)
- (29) 爾就丟棄僥我，猶之乎好似爾丟棄去一件唔要的物一樣。你丟棄我，就好像丟棄一件沒用的物件一樣。(《麥詩》[c.1893] 3.40b)

看來早期廣州話的「去」不單可以表方向，還有「完成」的意味。²⁹ 無論如何，「C類」的例子似乎不能說明「曉」和「咁」在語法功能上有甚麼差別。

【四】V + 曉 + C (D類)

- (30) 睇見佢就過曉去。When he saw him, he passed by on the other side. (Louis 1867:50)
- (31) 個時自是跌曉落去。那時自是掉了下去。(Piercy 1871:101)
- (32) 來擠僥入去在個一個金縢匱內處。放到了那一個金縢匱裏去。(《麥書》[1893] 3.23a)

²⁸ 「晒」有的時候像補語，有的情況又像體標記。這裏採用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頁159–61的處理方法。

²⁹ 聞語即以「去」表「完成」，參閱李如龍〈泉州方言的「體」〉和陳澤平〈福州方言動詞的體和貌〉兩文，載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頁195–224, 225–53。不過閩語的「去」可以出現在動補結構之後，顯然是一個成熟的體標記。至於為甚麼早期廣州話的「去」有「完成」的意思，由於已超出本文考察的範圍，所以不擬詳探。

- (33) 就享坐僥有七十五年皇帝咁耐呢的福澤。享受了當七十五年皇帝這麼久的一種福澤。(《麥書》[1893] 5.2a)
- (34) 咁垂僥落來，就泵泵下。就這樣垂了下來，搖搖擺擺的樣子。(《麥詩》[c.1893] 1.30b)

「D類」是指「曉」出現在動補結構的中間。這類例子所牽涉的補語成份，大部份都屬方向補語。剛才看過C類有很多「V + 去 + 晓」結構，但原來「V + 晓 + 去」也一早出現了(例30)。有一點需要注明：麥仕治的作品中並不是沒有「V + 晓 + 去」結構，只是數量不多而已。下面是其中兩個例子：

- (35) 出僥去郊外。到了郊外去了。(《麥詩》[c.1893] 2.3a)³⁰
- (36) 就流僥去。就流走了。(《麥詩》[c.1893] 3.33b)³¹

文獻中並存著兩種結構，反映出「V + 晓 + 去」和「V + 去 + 晓」當時正處於「競爭」的狀態。不用說，最後是「D類」勝出了這場比賽。

要是遇到複合方向補語(例31、32、34)，「曉」一律置於動詞和補語之間，和現代廣州話並無二致。³² 例(33)的「有」，據余靄芹的理解，是「一種用在動詞或動補結構後作肯定性的補語」，³³ 我們暫時把它歸入「D類」。

看過上述三十多個在早期廣州話語料中帶「曉」的例子後，我們馬上得到一個印象：「曉」和「咗」出現的場合似乎沒有明顯的分別。³⁴ 換言之，「曉」、「咗」可能只是詞匯層面上的差異。

劉丹青認為，一個成熟的體標記可以從以下四方面體現出來：(一) 謂詞提供了新信息，甚至是焦點所在；(二) 沒有可能式；(三) 可以接在動補結構後面；(四)

³⁰ 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在討論現代廣州話體標記跟動補結構的結合時說：「假如是簡單的方向補語，而又帶有表示處所的賓語時候，那麼『詞尾』(即本文的『體標記』)就加在動詞之後、補語之前。」(頁117)如「行咗落三樓」(下到三樓去)。麥仕治作品的「V + 去 + 晓」結構，數量縱使很多，卻從來不帶處所賓語。例(35)帶處所賓語，則採用較少見的「V + 晓 + 去」結構。這間接說明了張洪年提出的規律應該可以套用到麥氏的語言裏去。

³¹ 有一個和例(36)構成最小對立(minimal contrast)的例子：「咁流去僥咯。」(《麥詩》[c.1893] 3.60b)我們有理由相信：「流曉去」和「流去曉」在沒有處所賓語的條件下是自由變體(free variants)。

³² 參考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頁117–78。

³³ 余靄芹：〈粵語方言的歷史研究〉，頁502。

³⁴ 例(6)的「我有行曉」是個孤例，或可當例外處理。

不能接同類意義的純體標記。³⁵ 文獻中的「曉」大多數都符合這些條件。因此把它們都視為「純體助詞」，並無不妥。³⁶ 問題是也有少數例子，顯示出「曉」還沒有完全虛化的痕跡：

- (37) 倘若爾地果能去得饒自己顧自己有益呢一段私心。假如你們可以去除得到自己顧自己這一種自私的想法。(《麥書》[1893] 2.30b)

句中「去得饒自己顧自己有益呢一段私心」應該被分析為「V + 得 + 曉 + O」。這個「得」分明是個能性補語標記。³⁷ 句子前面的助動詞「能」是一個相當有力的旁證。如果我們的看法沒錯，「曉」只能視為補語。用現代的廣州話來說，「去得饒」就是「去除得晒」或「去除得倒」。例(37)在「曉」的發展史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後半部討論「曉」的演變途徑時，還要提到這個例子。

「V + 得 + 曉 + O」結構在文獻中畢竟只有一個，我們能否通過其他途徑，找到別的以「曉」作補語的例子呢？請看以下三例：

- (38) 都總唔能來除得佢去饒。不能把它掃光。(《麥詩》[c.1893] 1.20b)
 (39) 我就同爾剷饒、煮熟、燴到熾到合爾口味來食。我就替你切好、煮熟，燒得合你的口味來吃。(《麥詩》[c.1893] 2.6b)
 (40) 個的日子，就過晒去饒。那些日子，都已經過去了。(《麥詩》[c.1893] 2.22a)

例(38)和例(40)反映著同一個現象，我們先一併討論。例(38)牽涉可能式「除得佢去」、例(40)則有體標記「晒」。引用劉丹青對體標記所訂下的條件，上面例子的「曉」便肯定不會是純體助詞。我們懷疑這裏的「去饒」是一個複合補語，「曉」是補

³⁵ 劉丹青：〈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頁15–17。Anne Yue-Hashimoto (余靄芹) 在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 (Paris: CRLAO, EHESS, 1993), p. 69 中則提到了體補語 (aspectual complement) 和體詞綴 (aspectual suffix) 的分別。她認為體詞綴和詞幹是不能分割的 (inseparable)，但體補語卻可以和詞幹分開處理。

³⁶ 劉丹青〈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給「純體助詞」下的定義是：「意義廣泛虛化，只表示前面動詞的體，有廣泛的配搭面，可用在半實或半虛的體標記後，在有輕聲的方言中一般唸輕聲。」(頁21)

³⁷ 對於現代廣州話能性補語的情況，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說：「所謂能性補語，就是在本來一個謂補結構中，插進一個詞嵌 (infix) 而成。這個詞嵌，若是表示正面意思的，就是『得』，表示反面的，就是『唔』。」(頁119)

語的一部份。因為按照這樣的理據，「除得佢去嘵」才符合語法：它跟「除得佢去」有同樣的結構，即「V + 得 + O + C」。³⁸前文我們也討論過一些「V + 去 + 嘵」的例子，但由於出現的環境不一樣，所以這裏的「去嘵」和前述的「去嘵」可能屬於不同的結構。例(39)「剷餸」和「煮熟」對舉，兩者的語法結構應該十分相似。「煮熟」毫無疑問是動補結構，那麼「剷餸」的「餸」就應該是個補語。

劉丹青把由補語虛化至體標記的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其中第二個階段是「唯補詞」：「不能作謂語，緊接在動詞後，有或專門或寬泛的結果義，可以作為句子焦點，多數可以重讀，都有可能式，兼有某種體意義，但後面可以有（但不是必須有）純體助詞（沒有純體助詞的方言除外）。」³⁹我們建議把像例(37)、(39)這種「嘵」歸入唯補詞一類，它們代表了「嘵」發展為純體助詞之前的面貌。

縱使我們掌握了「嘵」虛化途徑的一些線索，但對它的「本字」依然沒有甚麼頭緒。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通過方言之間的比較。

和其他粵語方言的比較

「嘵」在廣州話中已經消失了，但其他粵語方言中可能仍然使用它。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東莞莞城話（下文簡稱「東莞話」）。東莞話的完成體標記是[hau³²⁴]，一般寫作「敲」。詹伯慧、陳曉錦編纂的《東莞方言詞典》為這個詞收錄了兩個義項：

- (一) 「用在動詞或形容詞後面，表示動作或變化已經完成：食～飯 / 放～學就去嬌玩 / 荔枝黃熟～」
- (二) 「用在形容詞後面，表示得很，非常之意：甜啲～非常甜 / 皓蘇～非常亮」⁴⁰

第一個義項是完成體標記，第二個義項是形容詞重疊式的第二個成份。這兩個義項看來沒有甚麼直接的聯繫，應該分開處理。下文只集中討論「敲」作完成體標記的用法。

「敲」在東莞話裏至少已經存活了三百多年，屈大均（1630–1696）《廣東新語》卷

³⁸ 可能有人會想到「去嘵」的「嘵」是個句末助詞：「去嘵」相當於現在的「去啦」。這個解釋的確相當吸引。問題是如果成立的話，我們將無法說明這個句末助詞的來源，以及它和完成體標記「嘵」之間的關係，現代各種粵語方言也不支持這種想法。

³⁹ 劉丹青：〈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頁20。

⁴⁰ 詹伯慧、陳曉錦：《東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120。

十一〈土言〉有這樣的記載：「東莞謂事訖曰効。」⁴¹ 屈氏是廣東番禺人。「効」現代番禺市橋話唸 [hau²²]，⁴² 和東莞的「敲」[hau³²⁴] 十分接近。⁴³ 加上詞義(事訖)上的高度配合，我們相信《廣東新語》的「効」和今天東莞話的「敲」是同一個詞。有趣的是，屈大均特別標明東莞用「効」，同時又沒有提及廣州話的情況，這可能是當時廣州話有另一個完成體標記。十九世紀末 Saunders 在 *The China Review* 上簡單介紹過東莞石龍的音系和詞匯。他把完成體標記寫成「休」_chau，⁴⁴ 可惜沒有提供任何實際的例子。

《東莞方言詞典》裏有不少帶「敲」的例句。我們發現：東莞話的「敲」和廣州話的「咗」在語法層面上沒有任何差別。只要把下列例句中的「敲」換成「咗」，就是廣州話的說法：

- (41) 銀包唔見敲。錢包不見了。【A 類：V + 敲】
- (42) 辛苦敲你成日真係多謝啦。辛苦了你一整天，真的很感謝。【B 類：V + 敲 + O】
- (43) 打爛敲就搞唔掂。把它打破了就不得了。【C 類：V + C + 敲】
- (44) 改革開放令千家萬戶富敲起嚟。改革開放使千家萬戶富了起來了。【D 類：V + 敲 + C】

新界圍頭話和東莞話有密切的聯繫。Barnett 曾經注意到圍頭話「陳」、「文」、「𠵼」等字由 -n 尾併入 -ŋ 尾，可能源自東莞話。⁴⁵ 稍後沙加爾對新界吉慶圍話進行了一次系統的調查，指出這種圍頭話和東莞石龍話「擁有很多共同的特徵」。他同意 Barnett 的觀察。⁴⁶ 張雙慶、莊初昇的《香港新界方言》記錄了蕃田、泰亨和蠔涌三種圍頭話的資料。它們是否都像東莞話一樣，以「敲」作為完成體標記呢？請看表一。

⁴¹ 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38。

⁴² 詹伯慧、張日昇：《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頁137。按：「効」即「效」之俗字，見《廣韻·效韻》「効」字下的解說。

⁴³ 番禺話沒有曲折調，所以只能以相近的中平調去模仿東莞話的讀音。

⁴⁴ C. J. Saunders, “The Tungkwun Dialect of Cantonese,” *The China Review* 22.1 (1896–1897), p. 471.

⁴⁵ K.M.A. Barnett, “Do Words from Extinct Pre-Chinese Languages Survive in Hongkong Place Name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4 (1974), pp. 137, 156.

⁴⁶ Laurent Sagart (沙加爾), “Phonology of a Cantonese Dialect of the New Territories: Kat Hing Wai,”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2 (1982), p. 158. 按：原文用英文發表，引文係由筆者翻譯。

表一 三種新界圍頭話的完成體標記⁴⁷

	去了	餓死了	花開了兩朵了
廣州話	去咗	餓死咗	啲花開咗兩朵
蕃田話	去來囉	餓死咗	花開咗兩□ [tyœŋ ³⁵] 了
泰亨話	去咗	餓死咗	花開咗兩□ [tyœŋ ³⁵] 了
蠔涌話	去後	餓死後	花開後兩朵

蕃田話和泰亨話都用「咗」[tʃɔ³⁵]，可能是廣州話的借詞。蠔涌話的「後」[heu³³]看來和東莞話的「敲」有關，這點在下文比較它們的音韻地位時會作深入的論證。⁴⁸

據《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中山（舊稱香山）石岐話的完成體標記是「哺」[p^hu⁵⁵]，⁴⁹本字不明。趙元任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所做的調查則記錄了三個標記：[p^hou⁵⁵]、[hou⁵⁵]和[ou⁵⁵]。他沒有說清楚這三個標記的關係，只寫道它們都是「動詞的詞尾，相當於廣州的『𠀧』、蘇州的『仔』、常州的『則』、北平的『了』。」⁵⁰把時間推得更前一點，Ball 在1897年一篇報導香山小欖方言的文章中指出：香山話從不用「𠀧」表完成，用的是「𠀧」，並注明這可能和廣州話的「嘵」是同一個詞。⁵¹他把「𠀧」拼寫為 *háu*，轉換成國際音標就是[hau⁵⁵]。如果不作一番考證，我們很難想像中山話的完成體標記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竟然至少發生了兩次重大的變化，即：[hau⁵⁵] > [p^hou⁵⁵] / [hou⁵⁵] / [ou⁵⁵] > [p^hu⁵⁵]。⁵²

澳門本來是香山縣的一個漁港，因此老派的澳門粵語基本上就是中山粵語的一個分支。林柏松比較過老派澳門話和新派澳門話的異同，他提到：「動詞 + 『敲』(hau⁵⁵) 表動作完成，是新澳門話的一個特色，它可能是受鄰近水上話『敲』(heu⁵³)的影響而變成的。」⁵³ 澳門話的完成體標記[hau⁵⁵]居然和 Ball 百多年前記錄的香山話一模一樣。但耐人尋味的是，林先生強調「敲」是新派澳門話的用法，而且認

⁴⁷ 據張雙慶、莊初昇：《香港新界方言》，頁746, 724, 751重繪。

⁴⁸ 蒙湯志祥教授告知，完成體標記「後」也出現在南頭話和寶安話中。一般認為南頭話、寶安話和東莞話具有較密切的發生學關係。但由於湯教授的資料還沒有公開發表，這裏不便引用。

⁴⁹ 詹伯慧、張日昇：《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頁277，「睡了」條。

⁵⁰ 趙元任：〈中山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冊（1948年），頁71，注13。

⁵¹ James D. Ball, "The Höng Shan or Macao Dialect," *The China Review* 22 (1897), p. 515.

⁵² 本文其中一位評審員引用趙元任1929年未發表的田野報告。趙先生把當時中山話的「休」記作[heu]。我們不清楚這個形式到底是來源於[hau]、還是[hou]的前身。

⁵³ 林柏松：〈近百年來澳門話語音的發展變化〉，《中國語文》1988年第4期，頁276。

為這個新式的完成體標記可能借自鄰近水上話的 [həu⁵³]。究竟澳門話的「敲」是存古（承繼香山話百多前的說法）還是創新（借自鄰近的水上話），需要仔細推敲。

南海地區的粵語方言一共有八個完成體標記，⁵⁴ 其中四個在讀音上和「曉」相彷彿，或者可以視之為關係詞。⁵⁵ 這四個完成體標記是：（一）[jəu⁵³]，流行於小塘獅北；（二）[həu⁵³]或[həu⁵⁵]，流行於鳳鳴三山、羅村務莊、小塘鶴巢里等地；（三）[ɛu⁵³]，流行於官窑的劉邊、唐邊、黃洞等地；（四）[ɛ⁵³]，流行於西樵、丹灶、沙頭等地。完成體標記如此豐富，一方面代表了語言接觸相當厲害，語言部件的借用非常頻繁；另一方面則反映了虛詞語音的弱化在不同地區有不同表現。

以上我們先後介紹了東莞、蠔涌、中山、澳門、南海五種粵語方言的完成體標記，發現它們擁有幾個共同的特徵：（一）聲母主要是 /h/；（二）韻尾都是 /u/；（三）以陰平調為主。惟一的分別是主元音。要尋求它的本字，首先便要確立它的音韻地位。下表列出東莞、蠔涌、中山（包括早期的香山和二十世紀以後的中山）、澳門四種方言完成體標記，⁵⁶ 以及早期廣州話「曉」的讀音，並分別與「休」（中古流攝開口三等）、「敲」（中古效攝開口二等）、「掉」（中古效攝開口四等）、「好」（中古效攝開口一等）四字進行比較。

表二 東莞等六種粵語方言完成體標記的音韻地位⁵⁷

	完成體標記	休	敲	掉	好
廣州話	hiu ⁵⁵	jəu ⁵⁵	hau ⁵⁵	tiu ²² ~teu ²² ^{注58}	hou ³⁵
東莞話	hau ²¹³	hau ²¹³	hau ²¹³	tiu ³²	həu ³⁵
蠔涌話	həu ³³	jəu ²³	hau ³⁵ 「巧」	—	həu ³⁵
香山話	hau ⁵⁵	əu ⁵⁵	hau ⁵⁵	tiu ³³	hou ²¹³

⁵⁴ 彭小川：〈南海方言的語法特點〉，載彭小川：《粵語論稿》（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99–101。

⁵⁵ 關係詞是指不同語言之間語音、語義都有對應關係的詞（或語素），但不能確定它們屬於同源、還是借用的關係。

⁵⁶ 南海地區的方言除沙頭話外均沒有詳細的記錄，暫時無法作出可靠的音韻比較。

⁵⁷ 表中「完成體標記」一欄，廣州話、香山話、中山話的讀音係根據早期文獻的轉寫，其餘三個方言點則依照現代的記音（資料的詳細出處見前）。至於「休」、「敲」、「掉」、「好」四字，一律是現代的唸法。這四個字在上述粵語方言中的讀音，過去一百年都沒有甚麼變動。

⁵⁸ 李新魁等：《廣州方言研究》，頁164；Robert S. Bauer（包睿舜）and Paul K. Benedict（白保羅），*Modern Cantonese Phonology, Trends in Linguistics: Studies and Monograph 102*（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7），p. 60。

表二（續）

	完成體標記	休	敲	掉	好
中山話	hou ⁵⁵	休 n̩uai ⁵⁵	敲 hau ⁵⁵	掉 tiu ³³	好 hou ²¹³
澳門話	hau ⁵⁵	休 n̩uai ⁵⁵	敲 hau ⁵⁵	掉 tiu ²²	好 hou ¹³

比較的重點在韻母方面。在每一列中(每列代表不同的方言)，凡是和完成體標記擁有相同韻母的字，我們都用灰色底色加以強調。例如廣州話「曉」、「掉」同韻，於是這兩個字都被打上灰色。

這五種方言的完成體標記雖然讀音相近，但音韻上卻並沒有顯示出規則的對應。我們根據韻母的歸併模式，把它們歸納為四個類型：

一、廣州型：完成體標記和「掉」同韻。同類型的還有早期的香港話；⁵⁹

二、東莞型：完成體標記和「休」同韻。同類型的還有濠涌話。

三、中山型：完成體標記(hou⁵⁵)和「好」同韻。

四、澳門型：完成體標記和「敲」同韻。同類型的還有十九世紀的香山話。

先談廣州型。廣州話「曉」以 /i/ 作為主元音，讀同效攝開口四等字，和其他類型以 /a/、/ə/ 等低元音為主元音的情況不太一樣。「曉」和其他類型的完成體標記不單在音韻上沒有平行的例證，我們甚至很難解釋這個 -iu 韵母到底和其他類型的韻母 (-au、-əu 等) 有甚麼承傳關係。從類型學看，無論是 *-iu > -au，還是 *-au > -iu，⁶⁰ 都是極其罕見的。幸虧在廣州話中有幾個和「曉」同韻的字帶有異讀，使我們知道 -iu 有來源於 -əu 的可能。

廣州話「掉」、「寮」、「撩」、「嚼」等字都有兩個讀音，韻母既可唸 -iu，也可唸 -əu。⁶¹ 很多時候我們根本看不出這些異讀有甚麼區別，或者只覺得 -əu 韵一讀比較少用而已。⁶² 表三把這些字的異讀都羅列出來。

⁵⁹ 指在香港出版的文獻所反映的讀音。

⁶⁰ James A. Matisoff (馬蒂索夫) 曾報告過一種由原始藏緬語 *-a 發展為西夏語 -i 的音變，他稱之為 brightening。見所著：“‘Brightening’ and the Place of Xixia (Tangut) in the Qiangic Branch of Tibeto-Burman”，載林英津等 (編)：《漢藏語研究：龔煌城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4年)，頁327–52。西夏語擁有多大 brightening 的例證。相對地，廣州話只有一個「曉」可能經歷過類似的音變，而且沒有平行的例子，所以不好引用馬氏的理論。

⁶¹ 在我們接觸到的文獻中，似乎只有吉川雅之談過廣州話中 -iu 韵和 -əu 韵的關係，見所著：〈音韻變化と粵語研究・廣東語教育：周邊韻母の承認を例に〉，載上田博一 (編)：《日本語學と言語教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年)，頁193–221。和我們的意見不同，吉川先生認為 -əu 是由 -iu 演變而來的(頁204)。

⁶² 李新魁等《廣州方言研究》頁164把「掉」、「寥」讀 -əu 韵母的例子處理為白讀音。

表三 廣州話 -eu 韻母和 -iu 韵母的異讀

	異讀1	異讀2
掉	tiu ²²	teu ²²
寮(空～～，空洞洞)	liu ⁵⁵	leu ⁵⁵
撩(撥取)	liu ³⁵	leu ³⁵
噍(咀嚼)	tſiu ²²	tſeu ²²
撓	kiu ²²	keu ²²
繞(纏著)	k ^h iu ¹³	k ^h eu ¹³
夾	kip ³³	kep ³³
曉	hiu ⁵⁵	(heu ⁵⁵)

異讀1和異讀2應該代表著兩個「同源層次」。王福堂說：「同源層次中的新音類是舊音類演變的結果，而演變應該是可以用音理來說明的。這裏把語音變化的過程看成是一個環環相接的鏈，那麼舊的語音形式總是這個音鏈的上環，新的語音形式總是這個音鏈的下環，兩者的位置不會倒置。」⁶³套用王先生的話，-eu屬於舊音類，是音鏈的上環；-iu則為新音類，是由-eu演變而來的。 $-eu > -iu$ 是一種非常普通的音變，曾經在不少漢語方言中發生過，包括新界的客語方言。⁶⁴放在這樣的框架下，我們可以認為：「曉」本應也有[heu⁵⁵]一讀。[heu⁵⁵]其後發展為[hiu⁵⁵]，而這個新興的[hiu⁵⁵]不久就取代了[heu⁵⁵]的地位。前文說過，Stedman and Lee (1888) 把廣州話的完成體標記標寫為_cheu。換成國際音標，正好就是我們所擬構的[heu⁵⁵]。然而，[heu⁵⁵]還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中古麻韻三等字廣州話普遍唸 -e 韵母，這個 -e 實際是由 -ia 演變而來的，只要和開平、恩平、東莞等方言比較一下就可以一目了然。庚韻三等字和麻三是一個平行的韻，經歷了-iaŋ > -ieŋ 的音變，主元音在介音 -i- 的帶動下由 /a/ 提昇至 /ɛ/。介音丟失以後，就成了今天的 -eŋ。⁶⁵廣州話的 /ɛ/ 既然有如此來歷，那麼我們也不妨把[heu⁵⁵]更早的形式擬構為 *hiau^{陰平}。如果屬實，廣州話「曉」的音變應該包含了兩個步驟，即： $*hiau^{\text{陰平}} > heu^{55} > hiu^{55}$ 。這個擬構一方面能照顧到東莞話和早期中山話完成體標記的讀音（分別只在於介音的有無），另一方面

⁶³ 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中的層次〉，《語言學論叢》第27輯（2003年），頁8。

⁶⁴ 張雙慶、莊初昇：〈一百多年來新界客家方言音系的演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12期（2003年），頁449。

⁶⁵ 李新魁等：《廣州方言研究》，頁132。

又解釋了廣州話的特殊發展方向。**hiau^{陰平}*可能是各種類型的「曉」/「敲」的來源。⁶⁶

中山話的完成體標記，Ball 1897年的記音是 [hau⁵⁵]，趙元任 1948 年的調查寫作 [hou⁵⁵]，兩者有三種可能的關係：(一) 最直接的方案，是認為 [hau⁵⁵] 演變為 [hou⁵⁵]，但我們找不到任何平行的例子；(二) Ball 記錄的是香山小欖話，而趙先生記錄的則是中山石岐話，可能這兩種次方言用了不同的完成體標記。不過，我們細心比較過小欖和石岐 -au、-ou 兩韻的分布，看不出有甚麼明顯的分別；(三) [hau⁵⁵] 和 [hou⁵⁵] 不是同一個詞。[hou⁵⁵] 可能是由「好」⁶⁷ 經感染作用 (contamination) 而產生的。⁶⁸ 第三個方案在音、義兩方面都講得通，比較可行。既然語源不同，那麼我們可以把中山型剔除掉。「曉」在粵語方言的表現現在只剩下三個類型。

澳門話的「敲」，我們認為就是 Ball 所說的「噏」。林柏松認為：「『敲』……是新澳門話的一個特色」，似乎沒有留意到 Ball 的記錄。而且林先生也沒有說明為甚麼水上話的 [heu⁵³] 借入澳門話之後會變成 [hau⁵⁵]。澳門型的「敲」和東莞型的「敲」，聲母、韻母、甚至調類都完全一樣，應該怎樣理解它們的關係呢？這是因為澳門話和東莞話同樣都保留了「敲」較早期的面貌。用發生學的術語說，就是共同存古 (shared retention) 的表現。

南海話的 [heu⁵³]、[eu⁵³] 和 [ɛ⁵³] 代表一個詞演變的三個階段：[heu⁵³] 是原來的面貌，它毫無疑問和早期廣州話的 [heu⁵⁵] 有關；h-聲母脫落了以後就是 [eu⁵³]；[eu⁵³] 如果進一步弱化為單元音，那就是 [ɛ⁵³]。和上述三個完成體標記不同，[jɛu⁵³] 只見於一個方言點 (小塘獅北) 中。分佈如此狹窄，我們懷疑它是通過語言接觸、從鄰近方言中借來的。換句話說，[jɛu⁵³] 和 [heu⁵³]、[eu⁵³]、[ɛ⁵³] 縱使讀音相近，但也許有不同的源頭。根據目前僅有的資料，我們暫時可以把鳳鳴三山、羅村務莊等地所用的 [heu⁵⁵] 歸入「廣州型」。

⁶⁶ 中古尤韻三等字，現代廣州話主要唸 -əu 韵母，而在 McCoy 的原始粵語 (Proto-Cantonese) 中則有兩種反映：**-əu* 和 **-iau*，其中後者和我們的擬構完全呼應。見 William J. McCoy Jr., "Szeyap Data for a First Approximation of Proto-Cantonese" (Ph.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1966), p. 157。

⁶⁷ 在中山話裏，「好」和完成體標記 [hou⁵⁵] 聲、韻俱同，只是聲調有別而已。參考表二。

⁶⁸ 這裏所指的是聲調上的感染。中山話一早已經有唸陰平調的 [hau⁵⁵]。當新的完成體標記產生時，就模仿它的聲調，形成「同一個詞類同一個聲調」的現象。同樣的例子還有廣州話的人稱代詞系統，參閱李榮：〈語音演變規律的例外〉，載所著：《音韻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 109–11。

東莞話的「敲」早見於三百多年前的《廣東新語》，在諸種以「敲」／「曉」作為完成體標記的方言中，歷史最為悠久。在表二中我們可以看到，東莞的完成體標記除了和「敲」同音外，也跟「休」同音。事實上，張洪年在考證廣州話「曉」的語源時，就提出過「曉」來自「休」的想法。他立論的主要根據，是 Stedman and Lee (1888) 一書把完成體標記寫作「咻」，⁶⁹ 而不是東莞話。「休」的確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本字，但在得出最終結論之前，必須找到更具體的證據，以及解決方言間韻母不對應等問題。

「休」具有以下幾項特質，足以使人相信它就是廣州話「曉」、澳門話「敲」和東莞話「敲」的本字。首先要談的是古文獻的寫法。除了 Stedman and Lee (1888) 和前面提過的 Saunders (1896–1897) 外，粵語講唱文學木魚書也有把完成體標記寫作「休」的例子：

(45) 過了小春廿月到。過休十二月，又是一年辰。(《日邊紅杏》)⁷⁰

「過休十二月」相當於現在廣州話的「過咗十二月」。文中「休」和「了」對舉，意思明顯不過。《日邊紅杏》的撰作年代已不可考，⁷¹ 但作者把完成體標記寫作「休」，表示廣州話的「曉」也曾經有過類似「休」的讀音。

其次我們注意到詞義上的配合。「休」的本義是休息、停止。《說文·木部》：「休，息止也。」⁷² 後來引申為完結。下面三個例子中的「休」，都有完結的意思：

(46)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今人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對「行休」的注釋：「指年命將盡，與〈遊斜川〉詩『吾生行歸休』句同意。遼《注》：『行休，即將退休。』非是。」⁷³ 「行休」可分析為「V + 完成動詞」，⁷⁴ 和《世說新語》的「言畢」、「食竟」、「聽訖」具有相同的結構。

⁶⁹ Cheung, "Completing the Completive," p. 143.

⁷⁰ 佚名：《日邊紅杏》（廣州：五桂堂，出版年份不詳），卷四，頁二下。

⁷¹ 《日邊紅杏》由廣州五桂堂出版。五桂堂創立於光緒中葉，至1972年才正式結業（參閱梁培熾：《香港大學所藏木魚書敘錄與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8年），頁253–56），因而無法確定《日邊紅杏》的撰作年代。

⁷²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陳昌治刻本（香港：中華書局影印，1989年），卷六上，頁二三下（總頁125）。

⁷³ 晉陶淵明（撰）、龔斌（箋）：《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五，頁399，注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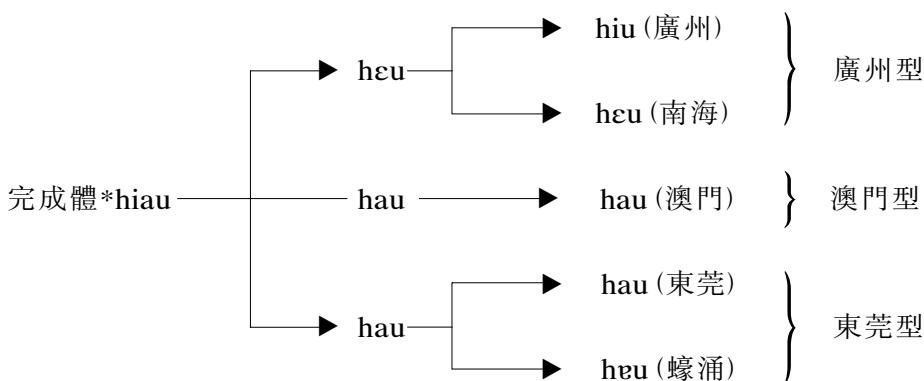
⁷⁴ 「完成動詞」是梅祖麟的術語，指表完成的動詞，如「了」、「訖」、「畢」等。見梅著：〈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載《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67。

(47) 敦煌曲子詞〈定風波〉(伯3093)：「更遇盲依(醫)與宣謝(瀉)，休也，頭面大汗永分離。」⁷⁵

(48) 《水滸全傳》第五十一回：「若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名也便休矣。」⁷⁶

不單古文獻如是，某些現代漢語方言的「休」也可以作完成動詞用，像江西贛州蟠龍客語的「休命」[*çiu²⁴ miā⁵³*]，就有「完蛋」之義。⁷⁷ 我們知道，完成動詞普遍都具備發展為完成體標記的性質，世界上很多語言都體現了這一點，詳細情形我們會在下一節檢討「休」的語法化途徑時再作交代。

讀音方面，我們先前已經根據廣州話的情況，把「曉」的原始形式擬構為 **hiau*^{陰平}。這個標記在廣州話和南海話裏都經歷過元音高化 (**iau*>*eu*)，廣州話更進一步發展為 [hiu⁵⁵]。東莞話和澳門話的特徵是丟掉介音，但主元音沒有變化。濠涌話雖然把韻母讀為 -eu，但卻合乎方言自身的對應規律。⁷⁸ 此外，「休」是中古曉母字，各方言讀 /h/ 其實是正常不過的。各方言「曉」的演變途徑可以概括如下：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為什麼廣州話會把「休」讀作 [jəu⁵⁵] 呢？我們認為 [jəu⁵⁵] 和 [hiu⁵⁵] 屬於同源層次的變體。先談聲母的情況。文讀音 [jəu⁵⁵] 以半元音 j- 作為聲母，這個 j- 並非由 h- 演變而來，而是 **hiau* 的 h- 聲母在文讀演變的過程

⁷⁵ 王重民(輯)：《敦煌曲子詞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50年)，卷一，頁19。

⁷⁶ 元施耐庵(集撰)、明羅貫中(纂修)：《水滸全傳》(香港：中華書局，1976年)，頁843。

⁷⁷ 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二卷，頁2026。

⁷⁸ 參看表二。「後」和「休」都讀 -ea 韻母。

中脫落所造成的。廣州話把中古曉母字唸成j-聲母的，還有「旭」、「衅」、「欣」三個字，⁷⁹ 均屬開口三等。同樣的，南海沙頭話和順德大良話有大量中古喻三、喻四字讀h-聲母的例子，如南海的「雨」[hy¹³]、「圓」[hyn⁴⁴]、「異」[hi²²]；⁸⁰ 順德的「遠」[hyn¹³]、「姨」[hi⁴²]、「鹽」[him⁴²]、「葉」[hip²¹] 等。⁸¹ 這些字在廣州話以及大部份粵語方言中都唸j-聲母。套用比較法，可以把它們的原始形式擬構為 *hi-（「異」、「鹽」等字）或 *hy-（「雨」、「遠」等字）。如果屬實，那麼就代表廣州話某些字曾經經歷過一個 *hi-, *hy- > j- 的音變。⁸² 這個音變和「休」的弱化是完全平行的。韻母方面，-iu 韵和 -ea 韵都是由 *-iau 韵發展而来的。它們之所以有不同的演變路向，可能和體標記的性質有關。體標記是個非常常用的虛詞。虛詞的演變速度較慢，演變方向也往往跟實詞不一樣。⁸³ 我們推測：當一般尤韻字已經參加了 -iau > -iou 這條音變規律時，⁸⁴ 完成體的「休」還依然唸 -iau。澳門話把完成體標記唸作 [hau⁵⁵]，主元音依然維持 /a/，沒有跟隨一般尤韻字變作 -eu，便是滯古的最佳明證。稍後 -iau > -iou 這條規律失效了，「休」就接受了另一種音變，即：-iau > -eu > -iu。這樣「休」和其他尤韻字就分隸兩韻了。

完成體「休」： $*\text{-iau} > \text{-iau} > \text{-eu} > \text{-iu}$

「休」及其他尤韻字： $*\text{-iau} > \text{-iou} > \text{-eu}$

「休」雖然有 [jeu⁵⁵]、[hiu⁵⁵] 兩讀，和文白異讀的現象頗相類似，但由於一般人根

⁷⁹ 李新魁等：《廣州方言研究》，頁209。

⁸⁰ 參閱彭小川：〈沙頭話古雲、以母字今讀初析〉，載《粵語論稿》，頁208–13。

⁸¹ James D. Ball, “The Shuntak Dialect,” *China Review* 25 (1900–1901), p. 66 為當時順德話的「有」字記錄了兩種讀音：零聲母的 *yaú* 是字音，而帶 h- 聲母的 *haú* 則是日常會話 (commonest speech) 的讀音。前者很可能是由後者弱化而來的。

⁸² 但我們不清楚這種音變背後的動因。也許是方言混雜的緣故。

⁸³ 梅祖麟說過：「虛詞在各種語言裏都特別保守，往往屬於更深一層的音韻層次。」見〈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載《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頁416。魏培泉討論古漢語指示詞「之」、「這」的關係時也曾經指出：「王力以為『這』是從『之』來的。雖然韻母上不大相合，但是這種指示詞在元音的高低上有變化卻並非不可能的，不能像一般實詞的音變那樣嚴格的要求。」見所著：〈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頁90。其實像體標記這類虛詞，很多漢語方言都體現了存古(如蘇州話的完成體標記「仔」)、弱化(如北京話的完成體標記「了」)等不依常規的演變方式。廣州話的「休」並不是個孤例。

⁸⁴ 關於 -iou 韵的擬構，見李新魁等：《廣州方言研究》，頁144。他們認為廣州市郊的蚌湖、龍歸把部份尤韻三等字讀為 -ou 韵是存古的表現。

本不知道 [hiu⁵⁵] 的本字就是「休」，所以不會產生徐通鏘所謂的「疊置式音變」。⁸⁵ 作為完成體標記，「休」的衰落並不是來自文讀音的挑戰，而是另一個詞完全取代了它。

可以看到，「休」無論是書寫方式，還是詞義、讀音等幾方面，都和「曉」相對應，我們相信它就是「曉」的本字。

「休」的語法化路徑及其消亡的過程

前面提過，「休」的本義是「休息、停止」，引申為「完結、完成」。事實上，世界上不少語言的完成體標記都來源於表完成的詞語，好像Cocama語、Kongo語、Tucano語、Tem語、寮語(Lao)、拉祜語(Lahu)、拉薩藏語等等。⁸⁶ 漢語方面，「已」、「訖」、「竟」、「畢」、「罷」這些在古代流行一時的完成體標記，本身統統都是完成動詞。⁸⁷ 現代漢語所使用的「了」也是一樣。因此，「休」帶「完成」義，就表示它具備了發展為完成體標記的潛質。

「休」在語法化前還應該經歷了一個充當結果補語(或者「唯補詞」)的階段。例(37)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保存了「休」較原始的用法。劉丹青曾經以蘇州話的「好」為例，說明「好」怎樣由謂詞、結果補語、最終發展成一個成熟的體標記。⁸⁸ 「休」的演變過程大概和「好」是平行的。

在十九世紀中後葉的廣州話語料中，「休」大部份情形下都以一個成熟體標記的姿態出現：可以出現在動補結構後頭、沒有可能式、跟其他純體標記發生排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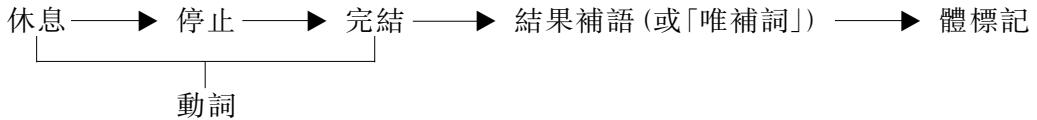
⁸⁵ 「疊置式音變」的定義是：「在存在文白異讀的疊置系統中……『不同系統的同源音類的疊置』則是不同系統的因素共處於一個系統之中，因而相互展開了競爭，如果其中某一個系統的因素在競爭中失敗，退出交際的領域，那麼在語言系統中就消除了疊置的痕跡，實現了兩種系統的結構要素的統一。我們把這種競爭的過程稱為疊置式音變。」見徐通鏘：《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389。

⁸⁶ 詳情見Joan Bybee,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58; Bernd Heine and Tania Kuteva,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8。

⁸⁷ 梅祖麟：〈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載《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頁67；李宗江：〈「完成」類動詞的語義差別及其演變方向〉，《語言學論叢》第30輯(2004年)，第2.3.2節「後加時態標記」(頁157–60)。

⁸⁸ 劉丹青：〈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頁13–17。

實詞的意義既不存在，那就是說「休」當時已經經歷了語法化的洗禮。「休」的演變歷程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階段：



和其他體標記比較起來，「休」的語法化途徑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可以說，「休」的語法化在某程度上體現了人類語言演變的共性。⁸⁹

接著要談的是早期廣州話的「曉」和其他完成體標記的關係。

Bridgman (1841) 和 Devan (1847) 出版的年份只差幾年，但前者只用「了」，後者只用「曉」，是否表示「了」在幾年間被「曉」取替了呢？我們認為不是。Bridgman 書中有不少內容是外國人向中國老師請教古文的對話。Devan 本身是個醫生，該書的編寫方針是以醫生和病人的對話為中心的。可能由於讀者的對象不同，所以影響了那兩部書的用詞。社會語言學中有所謂「高層語言」(high language) 和「低層語言」(low language) 的區分。⁹⁰「高層語言」是指統治階級或強勢社團所用的語言。相反，「低層語言」就是低下階層所用的語言。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猜測：「了」屬於高層語言，在較正式的場合中使用；而「曉」則是低層語言，用於日常生活的口語中。⁹¹換言之，「了」、「曉」的分野並不是歷史先後的問題。張洪年認為「曉」很早就存活在廣州話的口語中，甚至超越文獻所記載的上限。⁹²我們同意他的見解。

踏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曉」在文獻中以完成體標記出現的比例越來越少，到了四十年代就完全消失了。「曉」走向衰亡，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是「咗」

⁸⁹ 最近吳福祥提出用「人類語言演變的範圍」去檢視漢語歷史語法的演變，分辨「哪些體現了語法演變的統計共性，哪些是漢語語法演變的真正特性」。見所著：〈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的檢討與反思〉，《漢語史學報》第5輯 (2005年)，第六節「演變的特性與共性」(頁23–26)。

⁹⁰ 請參看Charles A. Ferguson: "Diglossia," in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A Reader in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ed. Dell Hym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pp. 429–39 對這個課題富開創性的論述。

⁹¹ 趙元任在《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1928年) 中，就把常州話分為「街談」和「紳談」。「街談」是一般市民的用語，而「紳談」是來自東南鄉少數官紳的用語。「紳談」、「街談」可以分別被視為常州話的「高層語言」和「低層語言」。中國境內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可參考游汝杰、鄒嘉彥：《社會語言學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⁹² Cheung, "Completing the Completive," pp. 159–60.

的出現。⁹³「咗」最早見於 Williams (1856)，寫作「阻」。作者對這個詞的解釋是：「A sign of the past tense, placed after the verb like *chiu.*」(頁26)這句話為「咗」(阻) / 「曉」功能的相似性下了一個很實在的注腳。「咗」、「曉」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直處於競爭的狀態。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咗」終於勝出了這場比賽，完全取代了「曉」作為廣州話完成體標記的位置。這種虛詞更替、但並不影響句法結構的現象，在漢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不時出現。梅祖麟作過一個很生動的譬喻：「句法結構不變，詞匯中的新陳代謝就像接力賽跑，一個運動員跑累了，另一個接棒跑下去。漢語語法史常有這種現象，所以有些現代漢語句型的淵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五世紀，完成貌就是明顯的例子。」⁹⁴語法化過程中有所謂「擇一原則」(specialization)，即「能表達同一語法功能的多種並存形式經過篩選和淘汰，最後縮減到一二種」。⁹⁵「咗」之取代「曉」，也可以視為廣州話「擇一」的表現。

「曉」總是黏附在謂詞的後頭。由於這種虛詞經常出現在口語中，久而久之，它的語音會受到磨損，最後弱化至以變調的形式依附在謂詞中。張洪年曾經深入觀察過「曉」弱化的過程，他認為弱化分三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 $V + \text{體標記}$ ⁹⁶

第二階段： $V^* + \text{體標記}$ (*代表變調)

第三階段： V^*

每一個階段都可以在早期的語料中找到證據。至於變調的規則，則要視乎前頭謂詞調值的高低：

$V [+高] + 晓 [+高] \rightarrow V^{55}$

$V [2\ 高] + 晓 [+高] \rightarrow V^{35}$

據張文的統計，Ball (1912) 用「曉」的例子有八個，佔全部完成體標記 16%；變調的例子則有二十二個，佔全部完成體標記 44%。⁹⁷後者差不多是前者的三倍。這說

⁹³ 張洪年嘗試為粵語的「咗」和吳語的「仔」掛鉤，認為它們都來自六朝江東方言的「著」，見 “Completing the Completive,” pp. 158–59。但我們認為張先生引用的證據略嫌不足。「咗」的語源始終是個謎。

⁹⁴ 梅祖麟：〈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頁72。

⁹⁵ 沈家煊：〈「語法化」研究綜觀〉，載吳福祥(主編)：《漢語語法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7。

⁹⁶ 原文是「 $V + \text{suffix}$ (後綴)」。為了全文的連貫性，我們把「後綴」改為「體標記」。

⁹⁷ Cheung, “Completing the Completive,” pp. 148–52.

明，以變調表完成，在二十世紀初的廣州話中曾經一度是主流。⁹⁸ 語音弱化，是「曉」走向衰亡的另一個原因。⁹⁹

結 論

或許有人會覺得考察個別詞語演變的意義並不很大，但本文把早期的廣州話「曉」放在一個較寬闊的層面上觀察，有別於一般「考本字」的文章：¹⁰⁰ 一方面我們努力地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廣州話文獻中發掘相關例子，另一方面又著重和當代方言進行比較。視野開拓了，我們自然可以看到更深邃的景觀。

總的來說，本文釐清了三個問題：(一)「曉」的語源；(二)「曉」在各種粵語方言裏的發展(音韻上和語法上的)；(三)「曉」在早期廣州話語料中所顯示的語法特色。「曉」的故事告訴我們：詞匯、語音和語法是三位一體的，研究歷史詞匯時不能不兼顧音韻和語法的因素。其實李方桂早在1974年的一次演講中就已經指出：

一個方言往往有一個方言的詞彙，是跟別種方言的詞彙不同。在一個方言裏有多少個詞彙，而且屬於這個方言區的，別的方言不用的，這類材料應大量地搜集，因為如果有些詞彙是屬於這個方言所特有的，那麼，一定在它的音韻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研究漢語音韻學，不僅是研究它的語音情形，我想與語法這門學問也有相當的關係。¹⁰¹

李先生主張把音韻學、語法學、詞匯學聯合起來解決語言學上的種種問題，並以它作為音韻學發展其中一個主要的方向。這番話在三十年後的今天讀起來仍然有其深遠意義。

⁹⁸ 從歷史材料看，以變調表小調，有的來自「V + 曉」，也有的源於「V + 吏」。我們打算在另一篇文章深入討論這個問題。

⁹⁹ 體標記弱化為變調，變調最後趨向消失，而新標記就在這時候進入語言的體系中，如是者循環不息。其實不單體標記如是，許多漢語方言的小稱形式也曾經有過類似的經歷，參閱郭必之〈南部吳語幾種小稱形式的內在關係及其來源〉(載林英津等：《漢藏語研究》，頁769–86)一文對南部吳語的報導。我們認為體標記和小稱的發展是平行的。這種彷彿像「輪迴」的語言演變方式，日後應該多加關注。

¹⁰⁰ 梅祖麟認為，漢語方言學中的「考本字」包含了兩種方法：「尋音法」和「覓字法」。本文所採用的是前者。「尋音法」有兩個功能是「覓字法」沒有的，即：(一) 分辨音韻層次；(二) 探索方言的語法史。見梅著：〈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頁414–15。

¹⁰¹ 李方桂：〈漢語研究的方向——音韻學的發展〉，載痲弦(主編)：《中國語言學論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7年)，頁230。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Hiu* in Early Cantonese

(A Summary)

Bit-chee Kwok Shin Kataoka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hiu* 嘻 in Early Cantonese (EC).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alternation between *hiu* and *zo* 味 is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grammatical changes in Cantonese in the past century. In order to achie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Cantonese, the story of *hiu* doubtlessly needs an in-depth examination. In this article, (1) EC materials compiled by missionaries and native Cantonese, and (2) inter-dialectal comparison will be served as the main basis for our discuss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hiu* was probably derived from the verb *jau* 休 (to rest, to stop). Following a general path of grammaticalization, *jau* has finally developed into a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We have presented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this *jau* as attested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 on the other hand, is a result of phonological retention. Grammatical words like *hiu* constitute an essential part of a language. It is thus instructive to undertake more research on these elements.